



张登国

从国际社会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社会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有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等国家。世界银行2017年曾经公布了一个经济体划分的标准，人均GDP在1006美元至3955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2236美元则属于高收入国家。墨西哥是拉美经济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墨西哥地理暨普查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1973年，墨西哥的人均GDP就达到101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1981年，人均GDP达到3614美元，但随后又一直下滑；1992年，人均GDP达到4210美元，跨越上中等收入线，之后缓慢增长；2011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达到10114美元；2014年，人均GDP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0837美元；2018年，人均GDP是9811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墨西哥自从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40多年时间里一直挣扎、徘徊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迟迟不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陷入典型的经济学上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分析墨西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发展战略失误导致扭曲的发展

墨西哥国民经济发展最初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模式，为了推进经济持续发展，逐渐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希望通过国有化浪潮来生产本土工业制成品以满足国内需求，从而替代所有进口工业制成品。当时，国内工业发展借助政府的干预和保护，减小了外部市场的冲击，并通过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国土资源发挥本国优势、大胆利用外资并适当限制外国专利等方式，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以上，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7.2%以上，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阶段，经济发展依靠高投资率和高物质消耗，国内工业制成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一旦大规模实行对外开放，国内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墨西哥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阵营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框架已无法继续适应经济发展的

全球化、市场化的新要求，没有及时转向外向型的发展战略，没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反而通过高估本币、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影响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导致国内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率低下。其本质是一种以计划机制代替市场机制的经济赶超式增长，造成市场扭曲和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另外，由于产品缺乏技术含量导致竞争力不足，进而影响到产品出口量下降，而进口设备和中间产品不断增加，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一直在扩大，再加上国际贷款利率的大幅度上升，国际储备日益枯竭，外债到期之时也无力偿还，最终演变为1982年的债务危机，外债额高达810亿美元，居高不下的外债使国家经济面临困境。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改革留有后遗症

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开始采用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墨西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88年，墨西哥开放了本国市场，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并没有使墨西哥摆脱困境，反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越陷越深。一是没有应对好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通过关税的降低、贸易壁垒的逐步取消，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国外资本大举进军墨西哥国内市场，导致很多本土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产生较高的失业率，影响了社会稳定。二是过度的私有化改革。1990年，墨西哥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实施私有化改革，外国资本大肆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转移和大量流失，同时也降低了墨西哥政府对经济命脉和国家资源的掌控能力，进而影响一系列民生领域的投资。

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匮乏

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要素。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经济增长较多依赖于引进技术、增加投资和低成本劳动力；而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以科技进步和高技术专业人才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墨西哥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单纯依靠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边

际效应递减，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明显不足，客观上需要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但是，由于墨西哥科技研发投入偏少、科研人员比例偏低、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等原因，导致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有限，缺乏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使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下降。比如，1989年，墨西哥高技术产品出口只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10.10%，2011年才达到16.51%，仅仅增加了6.41个百分点。2014年，墨西哥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0.64%，影响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如果实现不了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甚至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过快城镇化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1950年至1980年，墨西哥的城镇化率从42.6%提高到66.3%，2008年的城镇化率更是达到77.2%，赶超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墨西哥的过快城镇化导致城乡关系失衡并激化社会矛盾：一是超前的人口集聚和城市的承载能力失衡。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墨西哥的土地兼并、外资对农业的垄断、去农业化等，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谋生。而城市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基础设施不足、住房体系不够完善等不能有效满足人口大规模的城市集聚。仅以就业为例，墨西哥58%的就业人口处于既无保险也无福利的非正式就业状态，城市难以提供大量稳定的就业岗位。二是“城市病”的广泛存在。超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快速城市化，使城市人口过度集聚，仅首都墨西哥城就承载了全国大约20%的人口，由此产生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民窟等城市社会问题。数据显示，墨西哥全国总人口的20%，即1470万人口居住在贫民窟，贫民窟暴力犯罪、社会矛盾、城市冲突、聚众抗议、居住人口的子女教育等问题十分严重。而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又给经济发展带来掣肘。

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社会失衡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突出方面，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阶层分化的阶段。墨西哥人均GDP达到上中等国家标准，但是发展的普惠性、包容性和公平性

不足。在资源配置机制上，政府将更多资源向国际巨头和垄断资本倾斜，而税负主要由中低收入群体承担，基层民众存在较强的被剥夺感。截至2012年底，墨西哥全国贫困人口为5330万，占人口总数的45%。另外，墨西哥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基尼系数由0.67上升到0.78，已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研究表明，社会阶层的过度分化、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会制约普通民众的消费购买力，难以有效刺激内需，有碍于经济增长甚至会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为维护社会稳定、赢得民众支持、缩小贫富差距，墨西哥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又出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福利赶超”现象。墨西哥政府将重点放在扩大社会性支出上，社会性支出水平在1960年至2011年占GDP的平均比率为9.41%。但是，由于政府财力不足，“福利赶超”又通过扩大赤字来满足社会性支出需要，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再加上利益集团博弈、社会治理能力不强等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出现公共服务短缺现象。

总之，墨西哥的经验告诉我们，“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是国家的协调发展问题，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如果不能根据全球化大势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短板、发挥科技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解决社会贫富分化产生的社会矛盾，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问题作为一个非经济因素的社会问题是导致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不仅需要实施积极的全方位的经济结构转型、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趋势和新挑战、推动技术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国家内部结构性要素的均衡发展，还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消解社会矛盾、创新政策以优化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



愧于历史的光荣业绩。

坚守院士称号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涵养浩然正气。把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秉持科学思维、坚持科学态度、尊重科学规律、运用科学方法，严谨治学、求真务实，潜心研究、孜孜求索，倡导学术民主，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严格自律，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加强科学道德自律，严守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规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守正扬清、崇德向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在全社会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为社会发展提供“正能量”。

肩负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责任，注重提携后学。关心、爱护青年人才，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优秀科技人才，言传身教、甘为人梯，慧眼识才、奖掖后学，为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铺路搭桥，为青年人才施展才干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努力推动培养造就一批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引领国家数以千万计的工程科技人员健康成长，让优秀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薪火相传。

日本作为全球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十分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形成了全方位的教育培训体系、严格的专业资格认证、完善的职业培训制度，提高了社会工作者高质量服务社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准。

全方位的教育培训体系

日本早期的社工培训由成立于1908年的中央慈善联盟承担。课程培训采取由国家到地方的方式开展。1924年中央慈善联盟举办全国范围的社会工作培训课程。三年之后地方性的培训课程也迅速发展起来，其培训内容丰富，既包括社会福利事业、社区服务方面的内容，也包括财富分配和工人运动方面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提高社工专业化水平，政府开展学校教育。1946年成立了社会工作学校。1950年成立了社会工作初级学院。1958年社会工作初级学院升格为社会工作大学。日本社会工作大学是一所可以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4年制的正规大学。在日本，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除了完成在学校的专业课程外，往往还要完成校外集中讲座、职场培训、派遣培训等的实习任务。为了确保社工服务质量，1993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福祉人才确保法》。为了进一步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方位培训体系，日本政府先后建立了中央福祉人才中心、中央福祉学院、都道府福祉人才中心。传统学校教育是日本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培养重要阵地。截至2006年，日本已经有500余所学校开设了护理专业，主要分为社会福祉士专业和介护福祉士专业。

随着养老人才队伍的发展，日本政府根据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出台了系列不断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和措施的法律法规，专业人才培养日趋合理化。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日本福祉相关专业备受瞩目。从专业设置院校来看，各地至少355所大专院校设置此类专业，37所大学设有相关研究生院，19所大学设有相关函授研究生和本科课程，45所专科学校设有相关函授课程、18所学校设有夜大。从专业科目设置来看，其涉及社会福祉、护理保健、精神保健、健康科学、保健科学等科目，真正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学科体系。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接受不同程度的相关教育。

严格的专业资格认证

日本对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资格认证有严格要求，从业人员必须通过国家资格考试获得从业资格，才能登记注册成为社会工作者。专业资格主要包括社会福祉士、精神保健福祉士、护理支援专员、护理福祉士和居家护理专员等资格。其中居家护理专员资格有3个等级，在高校或者在民间通过短期培训获得其资格的社工主要从事承担护理机构中的老年人或残疾人的护理服务。相对而言，获得其资格难度大些，需要在护理福祉士工作5年后参加笔试和实际技能考试，通过后才能获得其资格。这为很多在校学生和家庭主妇增加就业机会。

二战后，随着日本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者资格认定制度逐渐建立。日本政府自1987年正式启动了社会工作职业资格制度化，在福祉领域建立了社会工作者、介护福祉士、精神保健福祉士3种国家认证资格，大大提高了社工的专业权威和职业声望，提高了社工专业化水平。1988年，日本正式开始实施社会工作者国家资格考试。严格的专业资格等级考试是日本对于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方式。

完善的职业培训制度

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为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纵观日本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悠久的发展历史，其经历了专职导入期、专职发展期、专职法定试任期、专职法定期和专职确立期等不同阶段，完善了注重实务经验、多元化的资格准入、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职业培训制度。

在专职导入期，即从1945年至1959年，日本政府对从事社会福利

日本专业严格的社工培养体系

牛月永

相关工作的专职领新人员进行资格认定和训练。出台了《社会福利事业法》，提出社会福祉主事制度，社会福祉主事作为政府公务员的一种资格被确立，同时又设置了相应行政机关“福祉事务所”，还成立了医疗社会事业家协会、社会事业学校联盟等相关社会团体和研究机关。医疗社会事业协会发布《日本医疗社会事业家伦理纲领》。

在专职发展期，即从1960年至1966年，日本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两级层面建立社会福利机构，成立了日本社会工作协会，并加入了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比如，日本医疗社会事业协会在1961年发布了《医疗社会工作者伦理纲领》，在1965年向日本厚生大臣提交了建立医疗社会工作者、精神社会工作者的资格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建议书。

在专职法定试任期，即从1967年至1976年，日本社会福祉学会公布了《社会福祉士法制定试案》。“社会福祉士”这个职业称呼第一次正式被使用，《社会福祉士法制定试案》也被称为“士试案”。由于无法处理好相关从业人员的利益关系等原因，该法案遭到了多方的反对，最后被撤回。

在专职法定期，即从1977年至2000年，日本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运动转为各专业领域的自行探索和尝试的状态。比如，1987年《社会福祉士及介护福祉士法》公布，1997年《精神保健福祉士法》出台。日本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在专职确立期，虽然中央政府层面的法律建设逐步完善，但是地方对资格制度的接受程度，包括民间对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认可”情况依然不容乐观，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来进行评定。2011年日本组建了“认定社会福祉士”的认证、认定机构，创设了“认定社会福祉士”和“认定高级社会福祉士”两种民间资格，也制定了相应的社会福祉士实践能力评价标准和晋升制度，提高了日本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服务实务工作能力。



(上接1版)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强化工程科技创新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院士创新引领作用，号召和动员院士立足本职工作，瞄准工程科技前沿，勇攀科技高峰，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打好主动仗，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从国家急需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组织和支持院士利用多学科优势对重要领域“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大力推动科技跨越发展，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工程化产业化，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对地方和企业创新的智力支持与科技服务，助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强化国际科技合作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工程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促进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合作，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在开放合作中

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全球伙伴关系，不断推动和深化双边、多边机制性合作，全方位、高水平、深层次地加强与世界各国间的科技交流合作与协同创新，瞄准国内外科技创新优势领域，重点推动与国外工程科技机构和智库的精准交流合作，携手各国专家共同探讨应对未来发展、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人类共同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创新治理，提高我国工程科技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让工程造福人类、科技引领未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守正扬清，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追求科学真理、致力科学报国是中国工程院的光荣传统，以钱学森、朱光亚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工程院院士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湛的学术造

诣、宽广的科学视野，为开创新中国工程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抗疫中，中国工程院组织动员广大院士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以钟南山、张伯礼、陈薇院士为代表的一批院士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逆行”冲锋奋战，投入武汉疫情防控主战场开展科学救治和研发，感召和带动了一批科技工作者奔赴武汉，彰显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坚持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胸怀科技报国富民之志，知重负重、攻坚克难，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坚定走好脚下的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刻心系党和国家，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